

日本明治大正年间的
中国戏曲研究



◎ 全婉澄 著

凤凰出版社

日本明治大正年间的
中国戏曲研究

◎ 仝婉澄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日本明治大正年间的中国戏曲研究 / 仝婉澄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506-2382-8

I. ①日… II. ①仝… III. ①古代戏曲—研究—中国
IV. ①J8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16655号

书 名	日本明治大正年间的中国戏曲研究
著 者	仝婉澄
责 任 编 辑	王爱荣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fhcbss.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 邮编:211523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69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2382-8
定 价	3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25-57572508)

绪 论

一、缘起

日本对于中国戏曲的研究兴起较早,江户时代即有学者关注,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则始自明治时代。就其深入程度而言,是中国本土之外的其他国家所不及的。同时,就对中国本土戏曲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大小来衡量,日本也占首位。本书选取日本明治至大正时期的中国戏曲研究作为对象展开探讨,力图展现这一时期中国戏曲研究的状况,并揭示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明治初年,西学东渐,日本重建整个社会的精神结构。时至明治中期,掀起了一股重新审视东方文化传统的潮流,如何看待东方特别是中国,成为一些知识分子试图探索并解决的问题。受到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戏曲小说等俗文学样式的地位逐渐升高,对中国戏曲的介绍和研究也悄然兴起。森槐南等旧式学人由词及曲,对于戏曲的兴趣由来已久,考证文字细致周密。一代文豪幸田露伴,品评中国戏曲作品,创作翻案文学,担负起介绍中国戏曲的角色。走出东京大学校门的年轻学子笹川临风著《支那^①小说戏曲小史》,介绍中国戏曲名作,评论中国戏曲特质,虽欠成熟,但有开创之功。他们开启了日本中国戏曲研究的源头。

① “支那”一词,在日本军国主义泛滥之时,明显带有歧视意味,故一般使用“中国”;今日本学者使用时多用“シナ”,以示区别。出于保存原貌的考虑,移录原词,下同此例,不复出注。

大正年间,京都帝国大学狩野直喜无论在使用材料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与前人有很大不同,开辟了科学实证的戏曲研究之路。森槐南的学生盐谷温,赴中国随叶德辉学曲,回国后执教于东京帝国大学,在元曲翻译和新材料的发掘方面着力甚深。地处东西两京的两位学者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成熟的研究方法,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戏曲的力量,奠定了日本中国戏曲研究的格局。另外,此期还有不少日本学者也纷纷加入到中国戏曲的研究队伍中来,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至此渐成气候。了解明治大正年间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从萌生至发展的整个过程,对于通观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 世纪初的中国,戏曲研究正从古代研究向现代研究转变,这种转变以王国维为始。王国维专事戏曲研究,仅用四五年的时间,却完成了颇具创造性的八部戏曲专著:《曲录》(1908)、《戏曲考原》(1909)、《录鬼簿校注》(1909)、《优语录》(1909)、《唐宋大曲考》(1909)、《录曲余谈》(1910)、《古剧脚色考》(1911)、《宋元戏曲考》(1912)。王国维的戏曲研究获得了西方学术界的认同,也在日本造成很大的影响。早在 1910 年,《曲录》《戏曲考原》就被铃木虎雄介绍到日本,铃木虎雄赞赏其为“空谷足音”。^① 辛亥革命事起,王国维随罗振玉避难京都,并于此地完成《宋元戏曲史》,震惊了日本学界。日本学者对王国维的大作推崇备至,青木正儿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是资料丰富,眼光燃犀,空前绝后的杰作。迄今,除非非常新奇的材料被发现,我们不能补充也无法修改先生的研

① 铃木虎雄:《王氏の曲录及び戏曲考原》,《艺文》第 1 第 5 号,1910 年 8 月。

究。”^①日本学者对王国维的推崇,加之对明治时期日本中国戏曲研究的忽略,使得中日两国学术界在研究这一段学术史时,大多仅从王国维对日本学者的影响方面切入,忽略了日本学者对于王国维的影响。

及至中国新文化运动开展,戏曲研究也日渐兴盛,中国学者对日本学界研究成果的关注,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切磋,也促进了中国本土戏曲研究的发展。因而探讨明治大正时期的戏曲研究对于了解中国戏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明治维新后走上扩张道路的日本亟待从多方面了解和认识中国,戏曲研究作为了解中国历史和国民性的手段受到关注,学术研究与当时之政治背景难脱干系。因此分析日本学者对中国戏曲的研究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日学术交流背后的政治动因。

二、国内外学者对日本中国戏曲研究的介绍及评述

20世纪初,国人开始翻译日本学者的相关论文。二三十年代,伴随中国本土戏曲研究热潮的到来,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逐渐引起国人更多的关注。但相关研究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算起,至本世纪则有明显的深化和拓展。下文将其分为20世纪前半期、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二十年、21世纪以来三个阶段加以述评。

(一) 20世纪前半期

甲午战后,中国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了迅速崛起的日本,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的浪潮。东渡日本考察游历的人数激增,翻译介绍日本国内情形的相关报道层出不穷。在这样的背景下,国人

^① 青木正儿:《王先生的辨发》,《学者追忆丛书·追忆王国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1月,页366。该文原刊于昭和二年(1927)8月《艺文》第18年第8号。

开始译介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戏曲的成果。

1906年《新民丛报》刊登渊实(廖仲恺)翻译的《中国诗乐之迁变与戏曲发展之关系》,该文乃采集日本学者的观点外加己见,综合而成。梁启超虽然不太赞同其中的个别观点,但称“其中所言沿革变迁及其动机,皆深衷事实,推见本原,诚可称我国文学史上一杰构”^①。1908年3月《月月小说》杂志第14号刊登了宫崎繁吉的《论中国之传奇》一文(原载于《太阳》杂志第11卷第14号),译者赞其“于吾国传奇之优劣,月旦甚详”。

以上只是关于日本中国戏曲研究的零星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戏曲小说的地位逐渐上升,一批学者加入到戏曲研究的行列中来,对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关注也随之而起。1926年,陈彬龢翻译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由朴社印行。同年,鹿原学人(姚伯麟)编译波多野乾一之《支那剧及其名优》,名之曰《京剧二百年历史》。^②1928年,江侠庵翻译的青木正儿《南北戏曲源流考》出版,^③同年,鹿原学人翻译了青木正儿1926年所作《自昆曲至皮黄调之推移》中“花部之勃兴”一节,更名为《昆曲皮簧盛衰变迁史》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1930年,上海北新书局选编《中国文学研究译丛》,收有汪馥泉翻译的盐谷温的《关于明代小说〈三言〉》、辛岛生的《警世通言三种》、长泽规矩也的《传奇四十种》、久保天随的《传奇四十种与新曲十种》、小川琢治的《天地开辟及洪水传说》、狩野直喜的《中国俗文学史研究底材料》、青木正儿的《“语物”底源

① 《中国诗乐之迁变与戏曲发展之关系》一文刊登于《新民丛报》1906年3月25号第77号。梁启超跋文中云:以余读之,殆译者十之七八,而译者所自附意见,亦十之二三也。

② 波多野太郎:《京剧二百年历史》,鹿原学人译,上海:启智印务公司,1926年。

③ 青木正儿:《南北戏曲源流考》,江侠庵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10月。

流》等日本学者论文十余篇,内中多戏曲小说等俗文学题材。同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张铭慈译述的森槐南《作诗法讲话》一书,其中第五章为《词曲及杂剧传奇》。同年9月,陈子展撰文《青木正儿的〈支那近世戏曲史〉》,称这部书是由青木氏之《南北曲源流考》《从昆曲到皮黄调之推移》两篇论文扩大组织而成,精彩之处也只在这两部分,并认为青木正儿贵古贱今之见,书中屡屡现之。文末赞誉此书“不能不算为叙述中国近代戏曲之变迁的第一部好书”。^① 1932年,贺昌群翻译了青木正儿《昆曲的演变和皮黄调的繁兴》。^② 1933年郑震编译了青木正儿的著作,名为《中国近代戏曲史》。^③ 1935年12月《戏世界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刊登《从昆曲到皮黄调》,由西湖散人翻译青木正儿之文。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古鲁翻译之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影响颇大,多次发行。连素来轻视日本学者研究曲学的吴梅也赞扬该书“遍览说部,独发宏议,旨旨所及,亦有为静安与鄙人所未发者”,^④并在与赵景深书信中提到此书。^⑤ 1941年,隋树森翻译的青木正儿《元人杂剧序说》由开明书店出版。1947年,隋树森翻译盐谷温《元曲概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外,长泽规矩也、盐谷温、田中谦二等人

① 《现代文学》1930年1卷6期。

② 青木正儿:《昆曲的演变和皮黄调的繁兴》,贺昌群译,《朝华》第3卷第1期,1932年。

③ 青木正儿:《中国近代戏曲史》,郑震编译,北新书局,1933年3月。

④ 吴梅:《中国近世戏曲史序》,见《吴梅全集·理论卷(中)》,河北教育出版社,页989—990。

⑤ 吴梅:《与赵景深论宋元戏文本事书》,见《吴梅全集·理论卷(下)》,河北教育出版社,页1130—1131。

的相关论文也被介绍到国内。^①

翻译引进日本学者的著作本身即是对他们的肯定,间有译者追溯日本研究中国戏曲的传统。如隋树森在《盐谷温元曲概说译本序》中说道:

中国小说戏曲之系统的研究,日本的学者似乎比我们本国学者着手得还早。笹川临风的《中国小说戏曲小史》,出版于明治三十年(公历一八九七年),远在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公历一九一五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公历一九二五年)之前。^②

并梳理了日本翻译中国戏曲的情况:

文化年间(公历一八〇四—一八一七年)便有人试译《西厢记》,后来冈岛献太郎、金井保三、岸春风楼、宫原民平,也各有《西厢记》的译本,宫原民平还译有《窦娥冤》、《老生儿》、《倩女离魂》等,盐谷温译有《琵琶记》、《桃花扇》、《长生殿》等,都很有名。……^③

王古鲁在《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1936年自刊本)一书中详细描述了日本中国戏曲研究的现状:

① 1938年《东方文化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刊登狩野直喜遗稿《元曲脚色考》。1948年《国文月刊》第63期,纪庸译田中谦二《元曲中之险韵》;1948年《国文月刊》第71期纪庸发表《元杂剧之题材》,文末注明以田中谦二之文为蓝本略加己见而成。1948年《国文月刊》第70期刊登纪伯庸《元曲助字杂考》,文末注明取材于人矢义高之文。

② 隋树森:《盐谷温元曲概说译本序》,《读书通讯》第48期,1942年。

③ 同上。

至于研究中国文学方面,以全体而言,亦无特殊的发展,除儿岛献吉郎氏的《支那大文学史》、《支那文学史纲》、《支那文学考》、《支那韵文考》;古城贞吉氏的《支那文学史》;久保得二的《支那文学史》;盐谷温氏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铃木虎雄氏的《支那诗论史》之外,著作不及研究史学部门之多。惟独在元明戏曲方面,大放异彩。这是不能不归功于狩野直喜、久保得二、青木正儿等人的努力。狩野氏为首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学长,极好中国戏曲。他所著《水浒传と支那戏曲》及《读曲琐言续》。将汲古阁六十种曲的《义侠记》《水浒传》以及其它杂剧,与《水浒传》比较研究,与日后我国胡适氏等人所著文字,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著《琵琶行を材料としたる支那戏曲に就て》,研究元杂剧马致远的《青衫记》与顾大典的《青衫记》的演变。久保得二氏的《支那戏曲研究》前篇关于《西厢记》的研究,确是极有精彩。狩野氏门人青木正儿氏,自受狩野氏教诲之后,二十年来,研究中国戏曲不倦,历次发表《南北曲源流考》、《昆曲より皮黄调の推移》、《沈璟の南九宫十三调曲谱と蒋孝の九宫十三调》,其后汇集而成《支那近世戏曲史》,亦一良著也。

王古鲁将当时日本学者的中国戏曲研究放置到中国学术研究的整体中进行评价,把戏曲研究看作日本在中国文学方面“大放异彩”的重要部分,可以说是对其成就的高度肯定。

1938年,《东方文化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刊登了佟晶心《从日本帝室博物馆陈列品感到中国戏曲史方法之宜改造》一文,文中指出:本文的主要点是因为看到了日本保留着许多旧鬼脸(北京人呼面具为鬼脸)和中国戏曲发生了关系,而才感想到戏曲史方法有改造的必要而写的,故先不讲中国古代演剧的事,但这些面具在中国确已然失掉痕迹。如同舞大面,要不是几年前看见波多野乾一氏

的《支那剧五百番》和盐谷温氏的《中国文学概论》，总也不会想出兰陵王的面具是什么样子。^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日本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关注。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已注意到日本学界的相关成果，以翻译引进其代表作品为主，以正面评价为多，亦有如卢前《评盐谷温元曲概说》（《说文月刊》，1941）之类的批评之声。

（二）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的二十年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这方面的成果较少，偶有关于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者的介绍，如台湾黄得时的《久保天随博士小传》（《中国中世文学研究》2 号，1962 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交流的逐步扩大，关于中日交流方面的书籍陆续出版，其间有涉及日本中国戏曲研究的章节，相关主题的论文也较多刊载。这一阶段与上期的介绍评价不同，呈现出深入探讨的迹象，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探讨日本研究中国戏曲的原因。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年 12 月）中的第十九章“明治大正年间的中国戏曲研究”，探讨明治大正年间中国戏曲研究的兴起问题。他认为，“首先，由于两国人士交往和交流增多，越来越多的人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中国戏剧的艺术价值”，“还有一个因素，是由于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些学者把中国戏剧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来提倡研究中国戏曲”，“还有一些人，则强调从中国戏剧可以了解中国国民性，从而提倡研究中国戏剧”。

第二，进一步加强对日本中国戏曲研究情况的认识。研究《西厢记》版本方面的学者蒋星煜，对日本学者在《西厢记》研究方面的

^① 佟晶心：《从日本帝室博物馆陈列品感到中国戏曲史方法之宜改造》，《东方文化月刊》，1938 年第 1 卷第 5 期，页 39。

成就较为关注,写有《日本对明刊本〈西厢记〉的版本研究》(《读书》,1980年18期)、《〈西厢记〉的日文译本》(《文学遗产》,1982年3期)等文章,从专题角度梳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张杰《简论日本近代的中国戏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2期)一文对笹川临风、森槐南、狩野直喜、盐谷温、久保得二等学者的研究著作详加介绍,进而论及日本近代中国戏曲研究的特点和地位。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7月)一书中有“东瀛的中国戏曲研究”一节,提出盐谷温是最初全力研究中国戏曲的人,翻译中国戏曲最多的是宫原民平,文末指出“总看日本四十年来的中国戏曲研究,从介绍书名,到译读名剧,到通论古今,到自作注释,进步的历程很明显。最好的成就,已经可以和我国的专门学者,上下议论,并驾齐驱了”。1988年,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这部书对日本学者的翻译及研究成果的介绍上有所拓展,资料价值较强。1991年,严绍璜的《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第七章“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形成”中设有“‘中国文学’近代性研究的形成”一节,涉及对笹川临风、盐谷温等人的中国文学研究的评述,文中给予笹川临风很高的评价,认为“我们可以这样说,笹川临风的中国俗文学观念,在19世纪的末叶,已经跨越了传统儒学(包括日本汉学)的界限,而把对中国小说戏曲的研究,带入了近代学术的行列。其后,日本中国学界在中国俗文学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业绩,都是以此作为起点的”^①。

第三,试图对日本中国戏曲的研究历程进行阶段性概括。张杰《简论日本近代的中国戏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2期)一文将日本近代的中国戏曲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① 严绍璜:《日本中国学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页361。

1868年至1897年,戏曲研究处于沉寂状态,但是年轻有为的汉学家主张对中国文学进行科学的研究,预示着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第二阶段从1897至1907年,伴随着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戏曲研究亦现端倪,笹川临风的《中国小说戏曲小史》较具代表性。第三阶段从1907年至二十年代末,东京帝大、京都帝大两所大学的学者成为中坚力量。

第四,王国维与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受到学者的关注。张杰《王国维和日本戏曲研究家》(《杭州大学学报》,1983年4期)一文中谈到王国维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西村天囚、盐谷温、青木正儿的交往及日本学者从中受到的影响。文中指出王国维对日本人研究我国戏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打破传统、重视戏曲研究的精神,给近代日本戏曲研究家以鼓舞。其次是他在戏曲研究中所运用的以考证为主,注重资料的收集、分析、使用的研究方法和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给日本学者以积极的影响。第三是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为日本学者所重视,推动了研究的深入开展。^①也有学者关注到王国维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1994年,钱鸥发表《京都时代之王国维与铃木虎雄》,提出“王国维经由藤田丰八,接触了《支那文学大纲》学者们的学术方法及明治三十年日本汉学界的新学风,是非常能想像的事吧。”^②

另外,这一时期出版了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一书,全书在国际汉学界的大范围下探讨学术与学人,其中第六章“东亚各国的学术交流”、第七章“近代日本留华学生”都与本论题有直接关联。该书所重不

① 张杰:《王国维和日本戏曲研究家》,《杭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页78。

② 钱鸥:《京都時代の王国維と鈴木虎雄》,《中国文学報》49册,1994年10月,页90—118。

在学术成果的评价,而是揭示学者的学术活动及其相互关系。

(三) 21 世纪以来

步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方法有所突破,研究进一步深入。

孙歌等著《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年 1 月)一书多数章节为专题研究,除在各处专题中谈到日本学者的学术成果外,第一章第一节“中国古典戏曲在日本”从中国戏曲的最初传入一直到 20 世纪末期日本学术界的情况都有涉及,第十章专论“日本近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将戏曲研究放置于时代和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探讨,提出“日本的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是与日本的东方学研究同时起步的,而且,它的出现与日本近代的人文思潮也有着密切关系”,并谈到明治、大正直到昭和初年,是日本社会与文化剧烈变动的时期,1894 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和起于 1866 年终于 1946 年的“言文一致”运动,两个事件对于中国古典戏曲研究具有绝大的影响。该书关注日本中国戏曲研究的外在环境和内在文化线索,拓宽和深化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2002 年以来,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一部至第五部陆续问世,该书注重从日本与西方、日本与中国及日本本身传统与现实的冲突等多角度对日本汉学的整体进行阐释,对于明治大正期中国戏曲研究者的介绍和评价提供了不少材料。

2004 年 8 月,中华书局出版张哲俊《吉川幸次郎研究》一书,这是国内有关日本研究中国戏曲代表学者的第一本专著。该书以七章的篇幅对“吉川中国学”的主要业绩做了详细阐述,其中第六章《吉川幸次郎的元曲研究》,分《〈元杂剧研究〉》《元杂剧的观众》《元杂剧的作者》《元杂剧的题材与语言的形式》四节对吉川幸次郎的博士论文《元杂剧研究》进行了仔细的介绍和分析。

黄仕忠的《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一书第一章《明治时期的中国戏曲研究》包括“明治时期的中

国戏曲研究”“明治时期中国戏曲研究的评价”“明治时期的中国戏曲研究对王国维的影响”三部分,对此论题有深入研究。

日本方面,综述性质的有传田章《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史》(《文学遗产》,2000年3期),田仲一成《中国戏曲研究在日本》(《人文中国学报》10期,2004年5月)。传田章将研究史分为三个阶段,介绍了大正初开始对元曲进行正式研究的盐谷温;构成战前元曲研究顶峰的京都学派,和战后在中国戏曲的社会学研究中居于领先地位的田仲一成。田仲一成的文章涉及的范围较广,他将相关学者划分为六种类型进行介绍,分别是“旧派汉学家系统(1890—1900)”“新派汉学家系统(1900—1930)”“语言学家系统(1910—1930)”“考证家系统(1930—1940)”“文献批判学家系统(1940—1980)”“近二十多年重视演剧的倾向(1980—)”,并将自己归入重视演剧倾向的系统。另外,在文末“补说”部分,提及波多野乾一、辻听花、滨一卫,认为他们是有关戏场表演的研究者。传田章和田仲一成都是研究中国戏曲的学者,两篇文章出发点有所不同,对照来看可相互补充。

专题性的回顾文章也有若干,如《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四卷的跋文其实就是一篇学术史回顾^①;另有田中谦二《日本元曲研究历史》^②;井上泰山《元杂剧的翻译和注释》^③、《元杂剧的传来和受

① 该文写于1968年7月,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四卷》,东京:筑摩书房,1968年9月,页591—611。

② 田中谦二:《A History of Japanese Studies of Yuan Drama》,《ACTA ASIATICA》16,1969年2月。后收入《田中谦二著作集》第一卷。

③ 井上泰山:《元杂剧の翻译と注释》,《东方》28号,1983年。后收入井上泰山《中国近世戏曲小说论集》,关西大学出版部,2004年:页246—255。

容》^①、《〈西厢记〉研究在日本》^②等文章。

另有回忆学者或书评性质的文章,诸如青木正儿《君山先生与元曲及我》^③等,在此不作一一介绍。

总之,日本学界对前辈的研究成果重视不够,或因涉及师承门派等诸多因素不便直言,对于该专题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三、研究方向与创新点

回顾相关学术史,可见前人在这个领域已经做有不少工作,部分相关学者的学术成就较为明朗,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目前的研究状况与该题目蕴含的丰富内容相比,还存在相当广阔的探索空间。

从研究内容来看,前人研究多集中在对于相关知名学者的生平介绍和学术成果的分析评论上,缺乏对其心路历程的发掘。从资料的利用来看,对于中日两国相关学者的日记、文集、书信等资料利用程度不够,进而阻碍到对两者间交流及影响研究的深入。

认识到过去研究的成果和局限,也大致明晰可以深入发掘的研究方向:第一,从文集、日记、书信、回忆录等材料入手,揭示相关学者研究中国戏曲的起因及历程。加强对关注度小但对学术有推进的学者的发掘。第二,加强对中日两国学者具体交往情形的描述,比较在同一问题上双方的研究成果,以期有所发现。第三,关注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戏曲时所使用的独特方法以及其产生的影响,并揭示其背后的原因。

① 井上泰山:《元杂剧の传来と受容》,《明治学院大学附属研究所纪要》8号,1984年。后收入井上泰山《中国近世戏曲小说论集》,页256—267。

② 井上泰山:《日本における〈西厢记〉研究》,《中国俗文学研究》第8号,1990年,页60—76。《中国近世戏曲小说论集》,页268—282。论文集《西厢记新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也有收入。

③ 青木正儿:《君山先生と元曲と私》,《东光》第5号,1948年4月,页15—18。

结合上述研究方向,本书的创新点在于:

1. 从在日本查访的原始材料入手,对江戸时期传入的中国戏曲文献作较全面的梳理,为研究明治时期及以后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提供参考。

2. 学界对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中国戏曲研究关注较少,本书利用大量日文文献,较为全面地梳理了这一时期的研究状况,首次介绍并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学者和材料。

3. 通过本书,揭示出日本明治大正时期中国戏曲研究对于中日两国学界的意义,从而证实其重要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撰写所需材料大多在日本,仅凭材料收集阶段在日本所汇集的材料自然不能满足写作之需。面对撰写过程中不断萌发的新问题,时常有“望洋兴叹”之感。其次,由于学养和经历所限,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局限性,意识到问题所在,却无法深入探讨之处往往有之。感谢导师黄仕忠教授在材料和方法上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才使得本书有完成的可能。部分日文翻译借鉴了黄仕忠教授的译文,特此说明。